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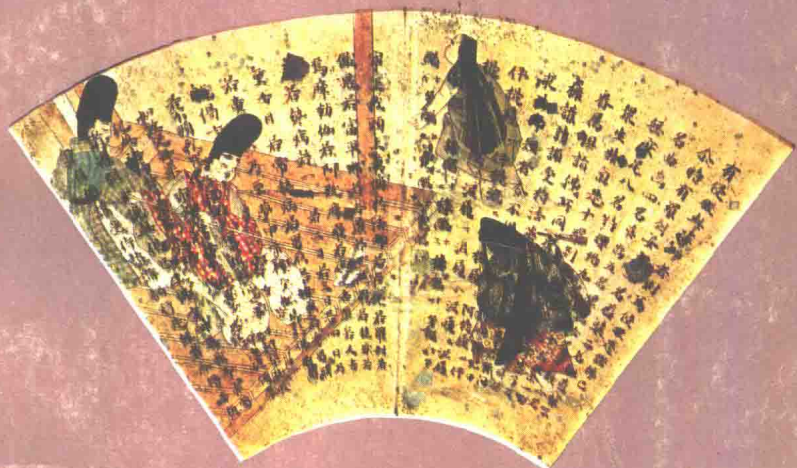
日本文化
研究丛书

日本文化的

R B W H D L S Z J

历史踪迹

主编
王 勇
王富平



日本文化研究叢書

日本文化的
歷史踪跡

王 勇 主
王寶平

杭州大學出版社

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

王 勇 王宝平 主编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电脑排版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9印张 220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ISBN7-81035-079-X/G·034

定 价: (平) 5.00 元
(精) 7.50 元

A

正
九

日本文化研究丛书

中方顾问 沈善洪

日方顾问 石田一良

主 编 王 勇

中国的日本研究： 一个简短的回顾

——代丛书序

中国历朝正史对日本的记载，不失为研究古代日本的珍贵史料；但《宋史》(十四世纪)以前的官撰史书，均把“日本传”归入四夷之部，故尽管记奇风异俗、朝贡封赐颇详，其本身还称不上是对日本的研究。

明代，日本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明史·日本传》自不待言，书名冠以“日本”的著作亦竞相问世。仅以嘉靖至万历约百年为例，研究日本的著作就可举出《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考》、《日本一鉴》、《经略复国要编》等，现已佚散的估计数量也很可观。明朝异乎寻常的日本研究热，究其原因，与倭患触发的海防关系密切，《日本考略·自序》云：“于兹猥属为《考略》，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可见这些著作类似于敌国便

览，偏重于概况罗列，而轻于研究探讨。

迨至清季，在西方文化反复冲击下，古老的汉字文化圈渐趋解体，尤其是日本率先维新成功，踏上“脱亚入欧”之路，迫使素以文明宗主国自居的中国，不得不刮目视之。在这种背景下，清代出现第二次研究日本的高潮。依赖文献和传闻研究日本的时代遂告结束，中国人终于走出国门，通过实地体验，为后世留下丰富的访日记录，如《日本日记》、《使东述略》、《使东诗录》、《日本纪游》、《谈瀛录》、《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东游日记》、《扶桑游记》、《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愚斋东游日记》等等，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是前代所无法相比的。然而，细读这些访日见闻，发现中国人所关注的，往往是日本西方化的层面，而非传统的思想文化，故可谓之“曲线的西方研究”。当然也有例外，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堪称明清日本研究的一座丰碑。

千余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已经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反观中国，自古以“华夷”色镜视人，一旦到了非摘下不可时，恍然犹如隔世，弱邻竟成强虏。甲午一战，“泱泱大国”败给“蕞尔小国”，从此中日反目成仇，更失去了客观研究对方的基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发过慨叹：“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读古书，足己自封，……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此种状况至民国更甚，戴季陶有感于“中国”这个题目被日本人无数次解剖、化验，而国人不愿读日本字、不愿听日本话、不愿见日本人，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于是发轫写了部《日本论》，算是填补了空白。清末以降，国人负笈东游者剧增，他们通过日语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却很少有专门研究“和学”的。“五四”前后，周作人、钱稻孙等致力于介绍日本文学，因囿于文人士夫圈子，终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般腾飞以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长期困扰日本研究的两大障碍——“华夷思想”与“敌国意识”渐被清除，短短数年时间，大学的日语专业成倍增加，各种研究机构纷纷设立，研究日本的第三次热潮，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席卷全国。尤其是近十年来，有关日本的翻译、著作、论文以几何级数猛增，这表明“日本”这个题目，终于被中国人放到手术台上认真地解剖了。稍嫌不足的是，解剖的部位存在明显的偏向，即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分野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而艺术、民俗、思想、宗教、社会等广义的文化领域则门庭冷落，鲜有人涉足。

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概念，很难作出精确的界定，或可比作对“日本”这个题目的综合解剖。从局部研究过渡到综合研究，是日本研究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其重要性渐为人们所认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自1985年始设日本社会文化硕士专业，杭州大学于1988年承办日本文化史大学师资培训班，均为日本文化研究的勃兴蓄积了人才。鉴于国内迄今尚无一块属于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学术园地，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这套丛书，显然正逢其时。但愿这套丛书能为日本文化研究摇旗呐喊，为中日文化交流添砖加瓦。

本丛书聘请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顾问，日本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石田一良博士为日方顾问，主编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担任，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编务。

编 者

1990年10月

目 录

中国的日本研究：一个简短的回顾

——代丛书序 编者 (1)

从若干史实看中、朝、日交流的

深远影响 颜锡雄 (1)

日本古代史与中国道教 (日) 福永光司 (13)

姜祝贤译

戚印平校

日本阳明学对中国阳明学的

继承与发展 屠承先 (22)

越系文化的一次重要东渡 张达人 (35)

论日本汉诗的历史地位 萧瑞峰 (40)

中国茶经与日本茶道 祝毓枕 李恩赐 (66)

自西徂东：葡萄牙与日本的最初接触 王 勇 (76)

初闯日本的荷兰人 (美) 唐纳德·基恩 (83)

王之光译

福泽谕吉及其启蒙思想 黄学健 (94)

江户时代流传日本的汉籍书目 王宝平 (108)

古写本《世说新语》考略 方一新 (121)

《剪灯新话》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马兴国 (132)

论日本与中国的《菜根谭》热

——《白话菜根谭》前言节选	林家骊 (147)
《助语辞》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王宝平 (160)
日本麈尾杂考	王 勇 (186)

榻榻米与日本人的姿态和视角	李国栋 (197)
中日交往书话	吕洪年 (201)
今日日本的家庭主妇	蒋 萍 (212)
风靡东瀛的《无锡旅情》	美国华 (215)

附录: 日本文化史汉文史料与解说

第一章 上古文化	(221)
第二章 飞鸟奈良文化	(229)
第三章 平安文化	(239)
第四章 镰仓文化	(249)
第五章 室町文化	(256)
第六章 江户文化	(265)
后 记	(278)

从若干史实看中、朝、日交流 的深远影响

□ 颜锡雄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看到亚洲东部有三个国家比邻而居，中国和朝鲜壤土相接，隔海相望就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由于地理上的缘份，自古以来，这三个国家的生活总是密切相关。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渗透。这种关系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不及的。

秦汉时期“渡来人”促 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原有“陆桥”相通，后来因全球气候返暖，一度存在的通途成了永久的汪洋，但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日本海的海流渡海往来。两国先民利用日本海的左旋

回流从辰韩出发到达日本的北陆、山阴地区（即日本海航路）和从弁韩、辰韩地区中经对马、远瀛（大岛）到达筑前的胸形（宗象，即北海道中航线）。考古发现文物说明，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前就相互来往，在文化上互相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有文字记载的可上溯到姬周文化。

王充《论衡》第十三超奇篇，第十九恢国篇等曾载周武王时代倭人进贡之事。《山海经·海内北经》亦有“盖周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记载。在日本备后国（今广岛县）御调郡三原町和备前国（今冈山县东部）邑女郡山手村，都曾发现先秦时代燕、赵、齐、鲁等国的货币明刀。考古学家在朝鲜半岛平安北道宁边细竹里、平安北道渭原、平安南道大同江西、全罗道康津等地先后发现明刀。这种古代燕国明刀分布现象，说明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文化经过朝鲜半岛已传入日本。

关心中日关系史的人都熟知徐福受秦始皇之命，率三千童男童女、五谷百工、弓弩手等渡海寻求仙药的故事。我国史书上关于徐福的最早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这部著作中三处提到徐福的事。《史记》以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亦提到徐福，但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都没有把徐福东渡止住之地说成是今天的日本岛，也没有说徐福东渡时经过的路线。到了五代后周缙徒义楚所撰的《六帖》（即《义楚六帖》）把徐福止住之地与日本联在一起。日本最早用文字写的史籍《日本书纪》并没有关于徐福的记载，记载这一传说的日本书籍是1339年北畠亲房撰著的《神皇正统记》。到南宋末年时，日本列岛上又出现徐福墓（和歌山市）、徐福庙（熊野），日本人把徐福传说具体化。

日本列岛从南到北有十几个地方至今还流传着生动、逼真的徐福故事。1989年4月佐贺市建市100周年时，曾举行《探索徐福之道》的日中友好学术讨论会，两国学者共同探讨中日两国

古代交流诸问题。我国连云港徐福研究会自1984年9月成立以来，对徐福东渡前行踪亦作了探讨，徐福学成了两国学术界感兴趣的一门学科。

徐福东渡时期正是日本弥生时代，弥生是日本尚无文字记载的先史时代，约在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一时代日本的社会比绳文时期生产力有进步，生产技术、桑蚕医药都十分落后的九州、本州等地由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主的飞跃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粮食时代，生产力突飞猛进，因而进入弥生时代。其原因是由于接受了来自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影响。生产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从中国大陆传入。将这些先进文化、知识和技术传入日本列岛的，是这时代来到日本列岛的中国移民。

这些移民是如何到达日本列岛的？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落后，他们不可能冒惊涛骇浪之险飘洋过海登上日本列岛，只能是沿岸航行，先到朝鲜半岛，再从那里进入日本列岛。

中国人口大批东移的原因可从天灾人祸这两个因素来考虑。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苛政猛于虎”，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比天灾带来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政治上专制，经济上横征暴敛，思想文化上禁锢，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举行起义，而一部分人口则向政治权力所不及的边境或周围国家迁移。朝鲜半岛在地理上和大陆相接壤，又远在边陲，是暴政力量所达不到的地区，是古代我国北方人民避乱之地，但这些人到达朝鲜半岛后，统治力量必然接踵而至，于是一批批移民又从朝鲜半岛逃至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从日本发掘出绳文后期的陶器多分布在九州至本州西部，与朝鲜半岛出土的文物相似，说明了有大量移民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

秦汉时期大批移民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列岛，促进了北九州、本州西部近畿一带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朝鲜半岛是中日

文化交流的中间驿站，这说明两千年前中国、朝鲜、日本的关系就已十分密切了。

友好使者来往密切了中、朝、日的关系

在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使者来往路线是经朝鲜半岛这条路线的。

公元 239、243 年女王卑弥呼两次遣使朝贡，266 年女王壹与派遣二十人组成的使团来中国。413 年至 502 年赞、珍、济、兴、武五王（即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天皇）先后十三次遣使朝贡，目的是修好。600 年至 614 年日本曾四次派遣隋使，从中国本土汲取优秀文化及输入佛教。遣隋使主要成员是中国人后裔，如随小野妹子西来的汉人高向玄理、倭汉直福田、书道庵、东汉长直阿利麻、东汉草直足屿等，均是经由朝鲜半岛渡日的中国人后裔。遣隋使路线从筑紫（北九州）经壹岐、对马渡抵朝鲜，沿朝鲜西海岸北上，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登陆，然后从陆路上洛阳。隋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往返的亦是这一条路线。到了唐代，国力兴盛，663 年唐、新罗联军与日军在白村江之战，日军惨败，促使日本转而采取亲唐外交，两国关系改观。日本慑服于唐朝威力，仰恭于唐朝的先进文化，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与模仿，形成一股学习高潮。从 630 年至 894 年的二百六十四年中，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实际入唐十六次，遣唐使入唐路线分北路、南岛路和南路三条。北路是初期遣唐使经过的航路——循筑紫、壹岐、对马、百济（后经新罗）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登州、莱州登陆，再由陆路循青州、曹州、汴州、洛阳而达长安，这条路较安全。而当时新罗依赖唐朝援助，与唐通好，日本亦与新罗重修旧好，故循此路。676 年唐与新罗关系恶化，与日

本之间关系也日趋恶化，日本才被迫开拓新的入唐之路，698年开辟南岛路，中期遣唐使均循此路，到末期又开拓了南路（大洋路）。

遣唐使团中重用中国人，使团中居重要位置者如第一次的惠日，第二次的高黄金，第三次的高向玄理，第十次的秦大曆，第十五次的韩国源，第十八次的丁雄满等。

大和朝廷中统治阶级主要是臣、连、公、直、造、首、史、村主等八族，这八族都是中国人血统。

前后二百六十多年的遣唐使给日本带来了改造国家体制、提高文化水平和人民生活等许多好处。遣唐使回国之后参与朝廷枢要，把在唐所学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政治机构付诸实施，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之律令为规范，在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领导下，由曾入唐的随员伊吉博德撰定。在学制、官阶、服装方面仿效唐制进行改革。遣唐使对日本文字的形成与发展贡献无与伦比，没有遣唐使就没有日本文字，没有汉字就没有今天的日本文字，日本现存的最古史书《古事记》（712）和最古的敕撰史书《日本书纪》（720）就是用汉字写成的，后来才发明了“假名”，假名的出现是遣唐使输入盛唐文明的结果，至今日本仍使用大量汉字。二次大战后，日本文字几经改革，至今正式使用的汉字仍有一千九百四十五个（人名用字另加一百六十六个，实际上是使用二千一百一十一个汉字）。遣唐使还从唐朝输入了音乐、医术、阴阳、绘画、棋艺等多方面的学问。随遣唐使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对日本文化和宗教的传播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奈良、平安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遣唐使的业绩在世界历史上两国关系影响这样深远是罕见的。

佛教、儒学仍然植根于今天 朝鲜人、日本人的意识中

佛教为印度释迦开创，公元 62 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372 年西晋派使节陪同僧侣顺道将佛像、经文送往高句丽，393 年高句丽的广开王在平壤建九寺。384 年东晋佛教由印度西域僧侣摩罗难陀传往百济，第二年百济沈流王在汉山（今京畿道广州郡南汉山）建寺，百济开始有了佛教，在各地建寺，大力兴建佛像、佛画、佛塔，由于沈流王以及王室、贵族接受佛教，因而佛教在百济兴盛起来。百济王是个佛教信仰者，百济向南朝梁武帝朝贡，得《涅槃经》及其解说书，还带回佛教学者、医生、工匠、画师等。百济属南朝佛教、南朝文化系统，与高句丽、新罗的佛教系统不同。五世纪初叶，佛教才传入新罗。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为了使在已经扩大的统治范围内的百姓服从，公元 528 年把佛教定为国教，国王自称为法兴王，今天保存下来的庆州佛国寺、石窟庵等就是当年国王热心于佛教的见证。以后高丽也完全继承了下来。花了数十年岁月和巨大精力制成的高丽大藏经刻板的完成，标志信奉佛教热潮达到了最高峰。

佛教走下坡是高丽末期，进入李朝时代以后。李朝太祖李成桂与高丽末期大儒郑道传等勾结推翻高丽王朝，采取抑制佛教、反对佛教的政策，佛寺逐渐迁到山中，佛侣也成为贱民中的一员。

公元 522 年左右，汉人司马达抵止日本，在大和高市郡坂田村建佛堂、摆佛像，早晚朝拜。不久，百济圣明王向大和朝廷献上释迦像、华盖、佛经，佛教传入日本。据圣德太子的《上官圣德法王帝说》、《元兴寺缘起》记载，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 538 年。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叶推动日本建国的苏我氏（亲百济派，

渡来人氏族)接受佛教,而掌管军事的物部和管理祭祀的中臣镰子则采取排斥态度。随着物部氏灭亡,佛教得到官民支持在各地建寺。588年画工白加、阳古等技术人员从百济抵日,参加兴建法兴寺(飞鸟寺),593年供佛舍利,法兴寺成为兴隆佛教中心。

这样,发源于印度的佛教经丝绸之路东传成为中国佛教,传到百济成为百济佛教,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佛教。

儒学发源地在中国。儒教指孔子的教诲以及继承和发展孔子教诲的孟子教诲。儒学分汉唐学及程朱学。汉唐学是汉代至唐代发展的儒学,程朱学也称宋学、性理学。

儒学对朝鲜影响极大,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精神支柱。朝鲜文化以佛教和儒学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朝鲜人在形成自己民族的同时亦确定了自己的文化。

集南宋时代朱熹学问大成的朱子学传入高丽是在高丽归属元朝以后,最初信奉者是安珣,1289年他在元都看到朱子著作后即专心学习。白颐正也在元学习朱子学,1313年回国后传给弟子李济贤。1314年元朝将朱子学定为科举考试必修课程,高丽人也参加考试,促进了高丽人学习朱子学,朱子学从此渗透到新兴的官僚阶层中。高丽朝末期,出现了李穡、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等优秀儒者。在祭祀祖先、丧葬等仪式中废除佛教仪式,改为朱子学礼仪,由于李朝排斥佛教,为朱子学成为国教打下基础。

李朝时代儒教朱子学发展很快,特别是从“戊午·甲子之祸”开始,由于政界内部纷争,儒者纷纷离开中央到山林、农村去专心做学问,因而地方上儒者辈出,在十六世纪时形成了李朝儒学黄金时代。其中最著名的有李退溪(1501—1570)、李栗谷(1536—1584)等,他们分别是岭南学派、畿湖学派代表人物,集朱子学大成,甚至对日本德川时代亦有影响。

佛教和儒学长期成为朝鲜文化中心思想,到今天仍深深植根

于朝鲜人的意识之中，如朝鲜人不信神，但在参加葬礼时，在佛坛前一坐，双手合掌拜神，在今天的南朝鲜，儒家宣扬的道德伦理、人生哲学以及人际关系。仍被一些人视为行为准则，儒家思想还被不少人作为宗教圣典加以信奉和顶礼膜拜。今天在南朝鲜共有儒教徒七十八万人，他们在各地开办了二百三十多所学校。宣扬儒学思想。在汉城的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孔子的信徒在这里举行盛大祭孔活动，不少青年人都读过《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这说明儒学影响之深远。

儒学东传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是公元285年（晋武帝太康五年、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学者王仁应在日的学者阿直岐邀请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据《续日本书纪》记载，王仁是汉高祖的后裔，亦称和迺吉师，东渡朝鲜半岛时方改姓。王仁之后六世纪时百济王派五经博士段扬尔、汉高安茂带去《诗》、《书》、《礼》、《春秋》等儒学经典。渡来人到处建神宫、神社，这是最初祭祀祖先的地方。祭祀活动至今仍不衰。如在京都有名的八坂神社中的祇园祭是祭高句丽渡来系氏族的氏神，现全国有末社三千个，稻荷神社是祭秦氏渡来人信仰的农业神，在全国有三万个末社。

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的儒学为汉唐学，为朝廷统治服务，与一般民众的生活、思想并没有什么关系。到了江户时代传入程朱学，江户儒学有古学、阳明学、考证学、折衷学。江户儒学代表者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等均是僧侣出身，属朱子学派。

藤原惺窝之前，在日本思想界扎根的主要是佛教、神道思想。

江户儒学始祖藤原惺窝是京都五山相国寺禅僧，因受朝鲜朱子学者姜沆的影响1600年9月毅然与佛教袂离而信奉儒学，立志成为儒者。惺窝的贡献是把世代为贵族垄断的儒学变为一般民